

# “乌托邦”并未走远——读《1984》有感

文/陈习之（16岁，中国大陆9年级学生）

《1984》作为世界名著，我是早闻其名。反乌托邦题材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作为对人类未来的黑暗幻想，它的分支很广阔，比如大名鼎鼎的赛博朋克电影《银翼杀手》（1982）就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电影。在这个世界中，人性的黑暗面被放大，或者说以一种直接明了、触目惊心的形式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脑中，剧情充斥着监视、告密、出卖等恐怖和血腥，而这些正是《1984》的主要元素。

对这个故事本身，我其实很早就有猜测：一个集权独裁国家的普通公民因为某种变故开始决心反抗，而他/她的结局要么是被摧毁，要么是战胜了邪恶势力。不幸言中，温斯顿作为故事主人公，没有过人的才华与能力，但凭借一点人性的本能，有了一点反抗的意识，可惜对手太强大，等待他的只能是被完全摧毁。

无法逃避的结局看似平淡，实则像命运一般，给人强烈的震撼。身处40年代末，作者奥威尔对于未

来的黑暗社会就有这样出色的先知般的描写，令人敬佩。你无时无刻不被监视，而你身边的人也随时可能会出卖你，你的一切都被组织控制，甚至是你头脑中的思想，你心灵深处最隐蔽的感情。

可以说，在《1984》的世界中，所有人都是被奴役和被损毁的，人们没有任何个人权利，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私人空间。所有人都得听“老大哥”摆布，而可悲、可怜地活着。其中有些觉醒的人拼死反抗，但却注定最后被摧毁，因为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另一部分则是像温斯顿的同事帕切斯一样，他们忠于党、服从党、相信“老大哥”所说的一切，但却因为在梦里一不留神说了句“打倒老大哥”，而被自己七岁大的女儿告发，直到被关在监狱里，他都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思议，依然在内心深处对党忠心耿耿。

老实说，《1984》的剧情并不是最精彩的，但它故事里所营造的恐怖气息和惊悚氛围，却让我感到呼吸困难。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被无情地操纵着，稍有差错就会被杀死。而温斯顿就是那颗出了差错的螺丝钉，他的毁灭代表了所有螺丝钉共同的命运。

国家机器是很可怕的，比如小说中所提到的互相矛盾的“双重思想”、“新话”、“罪行停止”这些元素，它们是极其荒谬和可怕的，但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事情却大行其道，且成为了你只有顺从才能够保命的唯一方式。显而易见，集权社会的特点就是将正常人变成奴隶和疯子，他要吸干你的血，最后把你像垃圾一样抹去。

《1984》是一个预言小说，历史证明伟大的奥威尔是对的。虽然我出生于比“1984”更晚的2004年，但就我从父辈那里听到的、从现实生活里感受到的、还有从书里读到的来看，我觉得奥威尔们的乌托邦还未走远……

## （←上接A4版）

更让人揪心的是美国泛滥的新冠疫情，因此造成的经济萧条，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疫情中表现出的无能和极端种族主义。这些都让许多人质疑美国未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质疑自己留美的选择到底是在追求美好生活，还是跳上了一艘泰坦尼克号；在近距离目睹西方民主的陷落和美帝国主义的余晖？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常常在烧烤摊上一边吃着串，一边在电话里奚落我如此地努力学习工作，到头来就为了在一个确诊人数破五百万的国家自我隔离地生活着。这种对美国政治的失落也让我常常怀疑，美国的今天到底是常态还是异态，如果是异态——即使特朗普败选给拜登，又还会存在多久？

这还没完。如果说近年来美国对参加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的大搜捕还可以说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合法正当的话，那么近一年来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对中国人的排挤和不信任则有麦卡锡浪潮卷土重来之势。这种针对最直接的表现是，一些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人的诛心提问，例如，“你为什么不公开批评共产党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的残酷政策”又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支不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这些咄咄逼人的提问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在这些涉及价值观“大是大非”的关键议题上不公开明确地表明态度，不公开和共产党划清界限，那么你作为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智库专家甚至是普通推特用户的一切言论都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你有“亲共”的道德瑕疵，要么就是你有自我审查之嫌。好在美国的中国专家当中还存在一些相对宽松的学术圈子与媒体平台。但是网上这些拒绝对话而

直接贴标签攻击，时常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的，极权国家是通过打击肉体来压制心灵，民主国家则容易出现“多数人暴政”，是让肉体自由而直接压制你的心灵。

另一方面，“美国那么差，为什么不回国”这或许是很多仍然留在美国的华人在与身在国内的家人朋友打电话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每个人对此的回答也不一样。许多中国人留恋的确是美国更好的自然环境，孩子更好的教育，更高的人均收入，以及更人性化的工作文化，例如按时下班、休假不被打搅等等。

而对于许多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则是不愿意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对于很多因为熟知中国历史而对政治有着天然不信任的人来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是可怕的。他们知道，即使美国有千般万般不好，这里还是有中国没有的、对政客嬉笑怒骂而免于恐惧的自由。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一书中提到，自己作为一个软弱的文人，在出现争论时，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极端打压，但往往觉得美国的许多强硬政策也有其道理。例如，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禁是不人道的、应该被叫停，中国在贸易、媒体权限和许多议题上的确对美国没有做到“互惠”，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放弃搁置是误判，在香港的治理和干预上太过粗暴等等。他们也深知，自己这种“斗争意识”不强的观点回到国内，在“bilibili一代”的小粉红们逐渐占据舆论场的今天，会活得很艰难。

今天活跃在中国电视上的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在一次采访中坦陈，自己当年也参与了“六四”的示威活动，并在1991受到“小处罚”后获批访美。他在访问期间成功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项目，却因看到已经在美深造的中国同学苦闷于在美国一直是“边缘人”、“局外人”，选择回到中国社科院继续工作。

但对于骑墙派来说，他们是很难像金灿荣一样从墙上下来的。麻省理工的黄亚生曾把中美关系的紧张之于华人，比做“母亲和丈母娘吵架”。一方面，这群知识分子不愿意被中国统战，对在海外做“爱国侨胞”或回去“建设祖国”没有特别的热情；他们虽然鼓舞于中国近年来扶贫和发展的成绩，却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方向并不认可。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即使认同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却并不想做“郭文贵”或“郝海东”，站在美国一边大张旗鼓地反共反华。

这可能是出于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毫无原则和底线的鄙夷，他们残存的朴素“家国情怀”，他们自己对中庸的固守，或是简单地因为软弱。而这种软弱与他们成长中所接受的对“汉奸”的憎恶教育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仍在国内的亲人朋友因为自己的言论受到打击报复。而出于现实的原因和父母意愿，带着父母移民的情况少之又少，这种软弱和牵挂在海外华人身上会是永久存在的。就这样，骑着墙的知识分子们看着自己在美国生活、工作、学习的空间因为冷战被日渐压缩，却无可奈何。未来是继续留下，是去新加坡，去加拿大，还是去欧洲？

作家方方曾写道，“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于这些活在夹缝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